

第四届“卿云杯”全国通识课程论文大赛 封面样张

学校	浙江财经大学	院系	人文与传播学院
专业	汉语言文学	姓名	黄之羽
年级	大三	任课教师	操乐鹏
课程名称	二十世纪文学经典		
论文题目	三岛由纪夫与莫言文本中的战争叙事		

三岛由纪夫与莫言文本中的战争叙事

——以《假面的告白》与《红高粱家族》为例

摘要：在世界现当代小说创作中，不乏作家对现代世界性战争的书写。其中三岛由纪夫、莫言对同一场战争所展现的侵略者、被侵略者视角及各自生成的叙事内涵值得探究。二者对“战争英雄”的理解各有不同，三岛由纪夫偏好向内深掘，于心灵之中供奉独自一份的死亡神灵，以期构造自我“英雄化”的神话穹顶。莫言则将笔墨落在小人物的群像中，以此类“祛魅”形象为代言人，游刃有余地传达超越时空的、反战的战争英雄观。且在意识形态的宏大叙事主流之下，二位于开辟个人化小说的叙事空间形式上执有一定的共鸣，力图呈现多维、真实的历史，进行战争叙事的重构。

关键词：三岛由纪夫；莫言；战争叙事；

文学叙写战争的传统，在手握战争权柄的神明降临于人世之时，便崭露它的头角。由战争与历史合流而成的文学作品，不仅是世界文学长河重要的支流，还自然成为今人透视那个时代政治、文化、经济乃至国家、民族关系的窥孔。而聚焦近代中日，战争便如瑰丽规整的廊柱后所投下的匿影藏形的阴翳，于二者民族血液的搏动中，划下细密而黝黑的波纹。本文将在确立正确历史观的前提下，于中日两国中找寻书写战争的代表作家、作品，以三岛由纪夫的《假面的告白》与莫言的《红高粱家族》为对象，进行其国家观、文化观与叙事观的辨异，梳理同时空视域下，二者所展现的战争视角、战争话语与战争立场。

一、反思亦或反观：战后战争叙事复杂的演绎样态

战争题材小说作为记录军旅战争体验、平民战争经历的一类体裁，因其具有某种程度上的现实性特征，不仅有助于读者对不同国家及民族的战争文化进行更深层次的理解，更因其雄浑、厚重的现实价值，而凸显作家多元的历史、文化责任。聚焦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日战争，我们不难发现因政治与战事的巨大影响，两国的战争文学创作皆进入了空前繁荣的状态，作家还原战争历史语境、反思战争创伤的热潮甚至延续至战后，呈现出个人化的叙述状态。

“抗日战争”或“第二次中日战争”，乃至支持“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拱顶，所于普罗大众而言，不过丰美树荫中一树清凉的幻梦一般。但毫无疑问，战争本身，正是国家意志中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中国在战后历经社会意识形态的松动，

到新时期，战争叙事由十七年小说创作中常有的“英雄叙事”逐渐解构为“个人叙事”，并逐渐呈现“后现代”的某些特征。反观东瀛，作为战争发起者与战败者，其不可撼动的“天皇神话”被美国的新殖民主义瓦解一空。战后左翼运动的兴起并不能缓和日本社会与美国殖民主义方针的对抗。恰如日本著名的“安保一代”导演押井守执导的作品《机动警察 2：和平保卫战》（1993），乃至其编剧的《人狼》（1999），或是其亲传学生神山健治执导的《攻壳机动队 S. A. C. 》（2001），无一不展示了 1960 年自民党通过《美日安保条约》后，日本自卫队与警察，警察与反安保斗争、左翼运动参与者激烈冲突的历史。战后颓废的人们于混乱中重构了生活，引发了一批知识分子对人性、社会、责任的默然的注视。

莫言与三岛由纪夫作为中日两国享有盛誉的作家，其作品大都聚焦于近现代中日战争，将战争作为国家意志中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描绘出来。莫言将齐鲁传统文化内化为鲜明泼辣的文学象征，用带有民族语言特色的行文歌颂人民抗战的愈合力、协同力、生命力。三岛由纪夫等一批作家试图复归日本传统，寻觅民族虚无主义的解药及与美国新殖民主义对抗的出路。

二、何为战争英雄：三岛“造神”与莫言“祛魅”

作为同一场战争中执有不同立场的东亚作家，三岛由纪夫与莫言却对“英雄”这一概念是同样痴迷的。“英雄”足以消弭历史与时空的藩篱，使历史朝向无限的价值空间。两位作者在塑造“战争英雄”时概念各异，但在解构国家意志，复归个人化的层次，持有一定的共鸣。

三岛由纪夫，本名平冈公威，1925 年出生于一个东京没落的华族家庭。《假面的告白》作为其带有一定自传色彩的小说，自然在身体叙事——心灵史的维度上，既反映自身身份认同，又写照现代日本民众于战后撕裂的精神创伤。在小说的开头，身体孱弱多病、性格内敛孤僻的男主人公被祖母圈养在窄小阴暗的卧室之中。阴暗、封闭的成长环境使他落下了“异常的性”“倒错的性”这一情结。这一情结在贯穿三岛夭折美学、性爱与死、肉体与精神的写作主题之时，亦隐晦地揭示三岛自身的悲剧命运。著名译者竺家荣就曾对“倒错”这一题眼有这样的评价：“与其说‘假面’是为了确认自我存在，不如说是对自我真实存在的怀疑与绝望。”¹

三岛在小说中曾谈到幼时曾用母亲的衣服扮作明治时期著名的女魔术师松旭斋天胜的往事：“‘我想做天胜’的心愿，‘我想做花电车司机’的心愿，两者虽然本质不同，但在我都有些朦胧的理解。最显著的差异，前者可以说完全缺少那种对“悲剧性”的渴望。对于“想做天胜”这一心愿，我始终未能尝到那种憧憬和愧悔焦躁的混淆。”但即便如此，在“我”闯入祖母的领地，大声叫嚷疯

跑的时候，病床上的祖母、与在一旁服侍的母亲与女佣，用坚决的沉默表达了她们的不解。三岛将这次真正被拒绝的“女装行动”其视作“先于罪衍的悔恨”的先兆，或是一种从反面的排拒爱的方法。在历经纤细敏感又长期封锁于迂阔女性教育的幼年时期后，他如无力破茧的幼虫，长期被“拒绝”的孤独所包裹裹挟。即使年纪渐长，这份被正常人生所回绝的畸形的渴望并没有得到丝毫缓解，反而将三岛拖下了虚无的深渊。在逐渐陷入这巨大的现代性悲剧情境之中，并为之演饰之时，三岛逃向了严整肃穆、阴暗辉煌的死亡之庇护：他所求的古典英雄式的、美丽崇高的死亡，便是他与虚无对抗的唯一武器。在《假面的告白》第三章中，被鲜血热烈的芳醇所吸引的男主人公，妄想成为圣巴斯蒂安那样殉教的英雄而应召参军，对此，文中如是描述：“命令下来时，我虽然也有些消极，但另一方面又在期待着光彩的死法，所以心里也就坦然了。”

他在同为“自白式”作品——散文《太阳与铁》中曾这样形容他日后在自卫队中的训练：“‘挺身’这种感觉，使肌肉跃动起来，我们同等地期盼着荣光和死亡。”²他成为集体战士中的一员的欲想，正如《奔马》中的饭沼勋崇拜古希腊的底比斯圣军、幕末时期的神风连一般。但因军医的肺浸润误诊，男主人公于战场中实现作为“英雄”的“天然的自杀”之念想，被生生扼断了。三岛因此在《假面的告白》中叙写道：“告别营门，我一路奔跑。冬日荒凉的山坡，向村子里倾斜。正如在飞机制造厂时一样，我的两腿在奔跑，反正不是奔向‘死亡’，也不是奔向‘死亡’那个方向。”³这段“自我缺失”的经历，与他日后企求锻炼出坚实健美的肉体，希求英雄殉难、决然赴死进程中所孕育的崇高之美密切相关。由此可见，三岛由纪夫心中的那樽丰丽壮美的神像，牢牢地把握着有关死亡之美的权柄，并将与此相关的造神的崇高幻化为屈服的盔甲，以“天然的自杀”被拒绝一事之剑伤，怠慢地拒绝着“我”的恋爱对象园子的疗愈，及消磨着战后“我”于“正常生活”的欲求。可以看出，三岛由纪夫在《假面的告白》中愈演愈烈的造神与自毁欲望与切身历经、但又如遥远乐音一般淡漠的战事粘合在一处，呈现了一种战争中国民之精神寄托的“另类模式”。

当我们把视角转换至终结乱世、一统民心的当代中国。艰苦卓绝的战事自然给历史题材小说留下了相当丰沛的创作土壤。小说创作者通过搭建纵深感的历史脉络，淬炼更加丰盈的时代性与民族性的英雄叙事。革命、抗战等英雄在历经左翼文学的发轫、延安时期形成乃至建国后形成的更为统一的叙事模式后，这套成熟的范式不仅贯穿了报告文学的文本表达，且如坚硬的珍珠一般，不断被岁月这一柔软的蚌肉所打磨，形成了更为坚固、更为稳定、更为圆融的美质。然而，随着意识形态规范的日益强化，英雄叙事中丰盈混沌的一面逐渐退出了文学创作，“高、大、全”的英雄形象削平了抗战时期人们的血肉与激情。作家们长于叙写

战争记忆，却在民族冲突与阶级对立的话题前畏葸不前。在熟练掌握塑造“政治符号”的同时，大批“沦陷区”与“国统区”作家也被流放在主流话语的创作权之外，无权发声。⁴

于是，人们在战后贫瘠的心灵荒原上建立起了新的“卡里斯玛权威”。逻辑严密的意识形态大厦从东方逐散去的硝烟中缓缓升起，以成体系的宏大叙事逐个击溃人嬉笑怒骂的天性。我们熟知的英雄：梁斌、柳青、孙犁、杨沫等人无一不将自身欲求、奋斗目标与国家、民族与人民的要求紧密结合。即便知识分子们投射在新信仰上的狂热与政府欲建立全新话语体系的想法不谋而合，这份塑造战争英雄的疯狂最终演化成解构政策、赢取名利的工具。在光鲜亮丽的英雄的权威背后，留下的依旧是一片创造力的荒原。这类禁锢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发展到极端，严重地戕害了文学创作的生机。

于是，我们不难看出，韩少功、莫言、残雪等人试图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合力推开“祛魅”的青铜重门，以自燃一般的激情，用骄纵、猥琐、病态、丑陋、痴愚等洪流将英雄叙事这一美好梦乡尽数冲散溺毙。怪诞污秽的意象天马行空般在字里行间折手起舞、肆意流淌，给读者留下狂躁、焦虑、不安的阅读印象。

八十年代的批评家们对此持有的态度是困惑的。以莫言为例，如果说《红高粱家族》中刘罗汉被活剥皮的情节尚在可忍耐、评析的范围内，莫言在《红蝗》《欢乐》等作品中所频繁呈现的丑恶事物——“大便”“人驴交合”等则是强烈地冲击着评论家们惯有的审美结构。1988年，莫言在《〈红高粱〉获奖及其他》中更是一反其先前于文学批评的态度——由谦逊恭敬转为批判、坚守。

正如其同年作品《红蝗》的结尾那般，莫言发出了他最为激烈、坚定的战斗宣言：“总有一天，我要编导一部真正的戏剧，在这部剧里，梦幻于现实、科学与童话、上帝与魔鬼，爱情与卖淫、高贵与卑贱、美女与大便、过去与现在、金奖牌与避孕套……互相掺和、紧密团结、环环相连，构成一个完整的世界。”⁵莫言的作品之所以被冠以“看不懂”的评价，无非是其反传统审美经验的、匠心独运的炫惑。抛去特意构造的成分，最明显的当属战争英雄的正义性与崇高性的祛魅。

在《红高粱家族》中，莫言改写了抗日战争中英雄角色的惯有套路，在行文中使用创新性的民间话语进行润色。余占鳌与戴凤莲一不是正统出身的农民或是知识分子，二不是具有崇高政治信仰的风云人物，一个杀人、入赁行当轿夫的土匪与一个无知、野蛮、不守妇道的乡村野妇，依旧能在胶平公路和日本鬼子杀得有来有回，于高密乡的历史上书写暴力、血性与纯真的战争英雄形象。余占鳌在显现他彪悍自然的民风所哺养的匪气的同时，挺身而出、荡尽日寇也是他为高粱馨香所浸透的肉体所作的、全盘迸发的野蛮抒情；“我奶奶“戴凤莲则周旋与余

占鳌与冷支队之间，用一杯酒化解男人之间的矛盾，促成他们合作抗日。山东老太一首快板“女中魁首戴凤莲，花容月貌巧机关，调来铁耙摆连环，挡住鬼子不能前。”也交代了“我奶奶”那有血有肉的抗日英雄事迹。民国28年，戴凤莲即使于抗日前线身死，其敢作敢为、敢爱敢恨的快意恩仇依然成为“小人物神话”的典范，于最美丽也最丑陋的文学祭坛上熠熠生辉。

刨去串联主线的二位主角，冷麻子、江小脚、任副官等配角也是不甚完美，但却也或明或暗地织就余占鳌轰轰烈烈的事业，以坚毅果敢、粗放有力的形象支撑着民间英雄神话洁净精悍的穹顶。其中，当属惨遭剥皮的刘罗汉最具“超人”气质。罗汉大爷作为烧酒作坊的伙计，对主家忠心耿耿、毫无保留。在被逼搬运石块的一节中，他面对监工的鞭挞，更是选择了隐忍退让。而在他选择逃出日本人的牢笼时，面对怯懦的骡子，他毫不犹豫地“里通外国”的黑骡投去了仇恨的铲子，将其击杀。最后被捉剥皮示众时，刘罗汉更是对着日本人破口大骂，至死方休。

莫言如是评价：“在某种意义上，英雄是天生的，英雄气质是一股潜在的暗流，遇到外界的诱因，便转化为英雄的行为。”⁶而这英雄，以本心为自身行为的准则，特立独行，遇强则强。他们的形象已然于传统的善恶两极祛魅，带着毅然决然的“恶魔”气质。

三、历史的“个人化”书写：个人意识与国家意志的分歧

如何将孤独的“战争英雄”呈现得精悍准确、震撼人心，莫言与三岛由纪夫在创作时有着不约而同的默契。作为一种另类的“生命叙事”，他们均将人物放置于无边无际、混沌无序的世界之中，强调其荒诞、苦难的相位。而发生于人本身的悲剧不仅仅归因于人的意志本身，更多是意志与意志，即人性本身与国家意志——集体意志维度上的抗斥。

让我们再将视角放回三岛由纪夫。1954年他创作了《上锁的房间》。叙写了一名官场精英与一位九岁少女进行畸形恋爱的故事。三岛一反以往明晰硬朗的文风，以繁杂颓废的笔触反映了美国隐性殖民统治下丧失主权的日本，人们以低尊严、低感知的状态苟且偷生的境况。由《英灵之声》到《奔马》的创作中，三岛愈加明显地将民族文化衰落的原因归咎于西方文明的侵入，乃至其最后兵变失败的结局，很多人对三岛最后执有的激进的民族主义立场表示痛惜与不解。对此，日本学者铃木贞美在“民族主义”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文化民族主义”这一概念，即反惯常的、从文化领域出发的民族主义。⁷而吉野耕作在《文化民族主义的社会学——现代日本自我认同意识的走向》一书中将其定义为：“通过文化自我认同的创造、维持、强化，争取民族共同体再生的活动。”⁸若要溯源三岛“文

化民族主义”上的创作转向，可以追溯至他于1968年写就的《文化防卫论》⁹。文中，三岛对罗斯·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所作的“菊与刀”定义加以赞同。一面是富丽优雅的“雅”文化，一面则是暴烈坚硬的“刚”文化。在战后现代日本失去文化传统的延续后，国民沉醉于暧昧不清的经济浮沫，满足于空虚的国际认同感。三岛在创作中不断强调人自身的弱点、局限，实质上不断求索着人心、人性于颓败的战后民族的愈合作用。如果说《假面的告白》中“我”只身参军，渴求死于“圣战”，实现天然的自杀是必然被捕获的官能手段，那么在决意以死明志的那天，三岛于战后日本洒下的那道血光，在一瞬间照亮他所有残酷的希求时，已将个人化的叙事扎入国家历史五彩的透镜中，显示出不和谐却鲜明存有的光华。

莫言相较于三岛，在文化上具有身份自觉的同时，更倾向于以其“中国经验”在“现实”中对垒此时期社会特殊、复杂与敏感的一面。除却揣摩人心，更是于创作模式上运用了真实泼辣的个人叙写。说书人模式的灵活运用，将在场者与叙述者的身份分割与串联。在《红高粱家族》中，有时“我”讲到动情处，便跳出故事来自我评论一番：“他（我爷爷）虽然具备了一个土匪所应具备的基本素质，但离真正的土匪还有相当的距离。¹⁰他之所以迟迟未入绿林，原因很多。概而言之，大概有三……余占鳌对土匪头子花脖子的做派有隐隐的敬佩感，同时又有憎恨。”由此来强调作品的民间立场，突出“我”作为后辈跨越时空叙写战争时的奇幻感。

使用现代写作技巧、表达现代精神的同时，我们还可以发掘莫言文中所表达的不同于国家意志的战争观念，其小说的哲学基础的本质，实是充满了反现代的历史观的。如需谈论国家之间的冲突，离不开立场、目标与利益三点要素。而独立的暴力作为一种手段，最终目标都是政治上的体现，例如建设自身的统治，扩展自身的力量，推行自己的理念，获取资源，改变生产关系等。那么不同的统治阶级决定了政权的性质，政权性质又决定了战争性质。当然，除却第三视角，各国的战争便一定是“正义”的。而在个人化的战争叙事中，我们能知道，在1938年那个高粱异常丰收的时节，一辆小推车给余占鳌送来了惨遭六个日本兵轮奸的二奶奶恋儿连着她年仅五岁的女儿。余占鳌在大屠杀后寻着了个被死马压断腿的日本马兵。马兵递给他一个透明化学夹子，上面有个甜蜜微笑的妇人还有个憨态可掬的孩子。余占鳌先是劈裂了日本兵的照片，随后无视豆官的阻拦，一马刀把日本兵的身体劈成两半。父亲恍然觉得，“爷爷这一刀，连爷爷也成了两半”……莫言在文本中无不处处暗示的“种的退化”，所反映的平等的非战主义，也值得读者掩卷长思。

虽然如铃木贞美所强调的那样，民族文化主义需强调去经济化、政治化，但

我们今日所去谈论的民族主义不是单纯所脱胎于“民族文化”或“国民文化”的。战争永远离不开意识形态斗争，就如莫言作品会被贴上“反团结”“传递错误史观”的标签相同，如今我们依旧在进行激烈的对抗与辩驳。由此，我们能认为符合人民利益、推动社会进步的战争，即为神坛之上不可侵扰的圣战，是疼痛中混合着悲哀的甘甜的、为侵犯未知的未知而复仇的全体人民的憧憬吗？在“我”个人化的视角中，战争不过是一座千人万人所垒成的坟茔。高粱穗子一般血红的天幕底下，死人疲倦的魂灵飘摇不定，正如红白布幕灯火中所照映的一种荒芜的甘美。这类从“人性”出发的战争叙事，自然比记叙劳动人民与统治精英的对抗有力得多。

四、结语

总而言之，三岛由纪夫与莫言在《假面的告白》与《红高粱家族》中以同一场战争为对象，以截然不同的立场叙写了当代战争背后的政治、社会、文化与心理因素。两位作家通过对战争历史进行的个人化的剖析与重构，还原了一个个生动的战争历史空间。此类赋予边缘化的人物前所未有的叙述权重的作品，依旧在督促着人们反思着真实的战争予人类的伤害、予世界的倒退。当然，在二十一世纪二十年代的今天，杀戮、文化、民族、战争依然是逃脱不了的议题。“借由这无数的战争支撑、在血腥上建立起的经济繁荣，这是对战争的恐惧而不在于好坏、不光荣的和平。”“我们要保护的东西是什么？我们要保护的这个国家和城市的和平到底是什么？”在《机动警察》剧场版中，柘植行人的同情者荒川曾对主角后藤抛出这样的疑问。也许，借助作者们的思考与记叙，世界上每一处良善、英勇的人们，或许能期许自我光明磊落地作出后藤的念白：“就算是伪装的、不光荣的和平，倒也比光荣的战争好吧。”

参考文献

-
- ¹ [1] 竺家荣：《怪作《假面自白》赏析》北京：开明出版社，1996年，第241-258页
- ² [2] 三岛由纪夫：《太阳与铁》，邱振瑞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1年
- ³ [3] 三岛由纪夫：《假面的告白》，陈德文译，辽宁：辽宁人民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
- ⁴ [4] 赵一凡：《中国当代小说中的英雄叙事》，《文艺评论》2016年第4期，第110-114页
- ⁵ [5] 中国小说学会编选：《红蝗》，江西：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3年
- ⁶ [6] 莫言：《红高粱家族》，浙江：浙江文艺出版社有限公司，2017年
- ⁷ [7] 铃木贞美：《日本的文化民族主义》，魏大海译，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
- ⁸ [8] 吉野耕作：《文化民族主义的社会学——现代日本自我认同意识的走向》，刘克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
- ⁹ [9] 三岛由纪夫：《文化防衛論》，东京：ちくま文库，2019年
- ¹⁰ [10] 贺玉庆、董正宇：《战争叙事的新变——论莫言小说〈红高粱家族〉》，《创作与评论》，2013年第18期，第125-128页